

伊朗“三环外交”战略透视*

——兼评冀开运教授的《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

赵广成**

内容提要 伊朗位于中东地区的核心地带，外部包着三个同心圆：周边国家、伊斯兰世界和有关大国。伊朗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一个具有大国抱负的小国，经常追求力所不及的目标，试图纵横捭阖于这三环之间。这种“三环外交”布局虽然有着深厚的传统，但超越了当今伊朗的力量所及和利益需要，经常使三环都呈现危机四伏状态。但是，伊朗在无可靠后盾的情况下，经常游走于危机之上与大国斗法，还能使局势不至于失控，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谋略。

关键词 伊朗外交 伊斯兰世界 三环外交

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伊朗人在伊斯兰教中信奉人数较少的什叶派，而且长期奉行反体系的革命主义外交政策，这使伊朗外交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伊朗政府的举动虽然经常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但其对外关系受地缘和宗教属性的强大约束，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始终是伊朗外交的支点。以这两大支点为依托，伊朗才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各大国打交道。

冀开运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伊朗问题的学者，长期以来对伊朗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的新作《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2年9月版）沿着时空交错、点面结合两条线

* 本文是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伊朗人视野中的伊朗外交理念及其实践”（项目批准号：12YJC770074）的阶段性成果。

** 赵广成，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西安710069）。

索,对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立体式的考察,在研究视角、结构布局和史料支撑方面都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为我国的 中东研究特别是伊朗研究奉献了又一部力作。该书聚焦于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重点是伊朗与其伊斯兰邻国的关系,其中贯穿着伊朗与各大国在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关系,为我们勾勒出了伊朗“三环外交”^① 战略的清晰轮廓。

一 伊朗的“三环外交”战略

伊朗外交虽然吸引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但长期以来是一个常规性题目,想写出新意并不容易。冀开运教授独辟蹊径,透过伊斯兰世界这一载体,清晰地梳理出了伊朗外交的立足点、优先方向和目标。他在《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一书中提示我们,伊朗位于中东的枢纽地区,以伊朗为中心向外观看将会发现,伊朗的外交战略中并存着三个同心圆,分别是伊朗与其邻国的关系、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以及伊朗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如果我们把伊朗的这种外交布局称为一种“三环外交”,那么,这种外交战略的成败取决于它能否实现这三环之间的平衡和协调。

伊朗有着 5000 多年的文明史,伊斯兰世界有多达 57 个国家,逐一介绍伊朗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显然是不可行的。而且,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一向深刻地打着世界主要大国的烙印,《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不能专章讨论伊朗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但又不能回避这一重大问题。为此,作者设计出了一个精巧的研究框架。在空间维度上,该书主要论述伊朗与伊斯兰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重点是伊朗与中

① “三环外交”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1948 年提出的英国战后初期的外交战略。旨在通过保持英国与美国、英联邦和联合起来的欧洲的特殊联系,维护英国的传统利益和大国地位。1948 年 10 月 9 日,丘吉尔在保守党年会上说道“当我展望我国未来时,我认为,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对于我们来说,第一个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个环是我国、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域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第三个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是并存的,如果它们联结在一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联合的力量足以推翻它们,或者甚至向它们挑战。现在假如你们想到这相互连接的三个大环,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个大环中都占一大部分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联结点上……”

东各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伊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时间维度上，作者的研究时段是从伊朗融入伊斯兰世界开始到 2009 年，重点是 1979 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重中之重是 1979 ~ 1989 年伊朗与主要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在关系内容上，涉及伊朗与相关国家关系的方方面面，但重点是双方的历史、外交和安全关系。在此框架内，作者没有专门讨论伊朗与外部大国的关系，而是把这种关系自然地穿插于伊朗与有关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中，从而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伊朗“三环外交”图景。

伊朗外交的第一环是与其邻国的关系，这也是伊朗外交的重中之重。距离对于国家间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空间上相邻或者实力上接近的国家，彼此打交道的机会多而且无法选择。根据地理机会（geographic opportunity）理论，一个国家的邻国数量与战争频率有着密切的关系，^① 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理论^②则预测，实力接近的国家必然爆发战争。所以，任何国家无论对其外交政策做何宣示，总是不得不把它与邻国的关系作为外交的第一优先方向。伊朗从古埃兰参与西亚北非争霸之时起，对外关系中就贯穿着两大主题：强盛时期塑造邻国的命运，衰落之时被邻国所塑造。这种塑造与被塑造不仅从根本上决定着伊朗人的历史命运，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自从 19 世纪陷入内忧外患后，强烈的不安全感使伊朗人对于外来威胁高度敏感，^③ 而这种防范意识首先是针对周边邻国。长达 8 年的两伊战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当今伊朗共有 7 个陆上邻国，与海湾六国隔海相望。陆上邻国除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外，伊拉克、土耳其、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均为伊斯兰国家，隔海相望的 6 个阿拉伯国家（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同样属于伊斯兰世界。这就是说，伊朗与

① James Paul Wesley, "Frequency of Wars and Geographical Opportun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 No. 4, December 1962, pp. 387 - 389.

② 权力转移理论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奥根斯基（A. F. Kenneth Organski）于 1958 年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书中提出来的。1980 年，他与古格勒教授（Jacek Kugler）合著的《战争总账》（*The War Ledger*）一书，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参见 A. F. Kenneth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③ 赵广成《从合作到冲突：国际关系的退化机制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 127 页。

教主流派与少数教派之间围绕经典解释的宗教矛盾。^① 阿拉伯人借助伊斯兰教把对伊朗的政治胜利变成了精神胜利，从而渗透到伊朗人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但是，作为伊朗人在精神领域里进行抗争的结果，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阿拉伯人宗教说教的同时，把自己的文明和思想在阿拉伯人中间传播开来。^② 伊朗是什叶派穆斯林的避难地和大本营，自16世纪初将什叶派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之日起，就与伊斯兰世界占主流的逊尼派国家处于冲突中。所以，伊朗作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世界虽然是其不可更改的外交立足点，但这个立足点向来并不稳固。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的敌人不仅是伊拉克，整个伊斯兰世界几乎都站在其对立面上，原因不仅在于伊朗是非阿拉伯国家，更在于其与逊尼派国家之间的宗教矛盾。

伊朗外交的第三环是其与外部大国之间的关系。伊朗处于伊斯兰国家的包围中，对外关系的首要对象是各个邻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需要经由伊斯兰世界。但是，从公元前2000多年起，伊朗各族人民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盛极一时的帝国和王朝，它们不仅称雄从地中海到印度、从阿姆河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而且顽强地与同时代的其他世界强国争夺地区和世界主导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伊朗人的较量对手涵盖了各个时期的主要大国，包括亚述帝国、巴比伦王国、古埃及、古希腊、马其顿帝国、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沙皇俄国、大英帝国、苏联和美国。在这些大国中，有的本身就是伊斯兰国家，非伊斯兰大国也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这种状况决定了伊朗与外部大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是彼此交织的。正因如此，冀开运教授把伊朗与各个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置于伊朗与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从历史纵深、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角度”透视伊朗与有关大国在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关系。

伊朗的上述经历铸就了伊朗人的历史自豪感和大国情怀，这使现代伊朗仍然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并且以一己之力

① 赵广成《从合作到冲突：国际关系的退化机制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135~138页。

② 阿·德赫兰·穆塔哈里耶《论伊斯兰教与波斯文明之关系》，载《伊斯兰教与波斯文明》，1990，第150-151页。

长期奉行与美国等大国对抗的外交政策。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依靠美国的支持赶走了苏联占领军,也收回了英国攫取的在伊特权,进而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支柱之一。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伊朗政府奉行“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外交政策,把美国、苏联和法国分别称为“大撒旦”、“红撒旦”和“小撒旦”,把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称为它们的“私生子”,把所有的反对派团伙称为“撒旦的仆从”。^①这种革命输出和四处出击的政策使伊朗外交危机四伏,导致伊朗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长期紧张。进入新世纪后,核问题为伊朗招致了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使伊朗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鲁哈尼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与西方关系的举措,才使伊朗与大国的关系走上了改善的轨道。

伊朗的“三环外交”战略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伊朗是一个处于重要地理位置上的小国,这决定了世界各大会长期保持与它发展关系甚至控制它的兴趣。与此同时,伊朗在中东地区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领土面积和人口分别位居该地区第二位和第三位,而且还有长期称雄世界和与大国较量的辉煌历史,这决定了它必然会有着不可磨灭的大国抱负和与大国斗法的战略勇气。第二,伊朗位居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处于伊斯兰教国家的包围中。无论是外部势力企图控制它,还是伊朗有意与外部大国发展战略关系,都必须通过伊斯兰世界这个中间环节。因此,伊斯兰世界既是伊朗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又是大国介入伊朗的中转站,对伊朗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三,伊朗以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什叶派为国教,伊斯兰共和国又有着强烈的原教旨主义倾向,这注定了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且经常与各伊斯兰国家发生龃龉。

伊朗外交的核心课题是如何处理好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为了处理好这三个方面的关系,伊朗政府的外交政策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必须奉行睦邻友好的邻国政策,处理好与 13 个海陆邻国的关系,否则将会陷入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困境。第二,必须坚持相对温和的什叶派宗教

^① David Menashri, *Iran: A Decade of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London: Molmes & Meier, 1990, p. 10.

路线，通过凸显不同避免被主流的逊尼派伊斯兰教所稀释，^① 通过温和和务实避免在伊斯兰世界孤立无援。第三，必须借重大国的力量维护安全和实现发展，但绝不能被国民认为充当了某个大国的附庸，否则将会使政权陷入合法性危机。

二 伊朗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其特征

冀开运教授指出，伊朗的外交政策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民族心理、历史传统、领导风格、革命信仰、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国际体系和国家利益的影响。^②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伊朗的“三环外交”战略中贯穿着一些不变的主旋律。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因素的优先顺序又有所不同，使伊朗的外交政策又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伊朗历史上多次出现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阿夫沙尔王朝（1736 ~ 1796）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个盛世王朝。阿夫沙尔王朝解体后，伊朗和整个伊斯兰世界一起，进入了新一轮的衰落周期，在北、南两个方向上长期面临着俄、英两国的威胁。伊朗不仅在俄、英两国手中丢掉了大片领土，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两次被这两个国家分区占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伊斯兰世界已经不再是稳固的后院，与大国的关系成为伊朗外交的头等大事。恺加王朝（1786 ~ 1925）不得不放弃历届波斯王朝的大国外交路线，转而奉行借力打力的“第三方外交”战略，试图借重其他大国的力量制衡俄、英两国的扩张。伊朗“第三方外交”的首选对象是美国，但因远水解不了近渴，伊朗政府只能另觅他途。

① 近代伊朗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萨法维王朝的开国君主伊斯梅尔强行将在伊斯兰世界中处于少数的什叶派定为伊朗的国教。因为萨法维王朝建立之时，奥斯曼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同时又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而主流伊斯兰世界信奉的都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伊斯梅尔作为一个非阿拉伯民族的领袖，如果不能在宗教上凸显与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不同，就很难为伊朗作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大国自立于奥斯曼帝国的卧榻之侧找到宗教上的合法性。所以，伊斯梅尔强迫伊朗人改信了什叶派伊斯兰教。宗教争端招致了延续 200 多年的萨法维—奥斯曼战争，但正是这种宗教不同和长期战争使伊朗避免被奥斯曼帝国吞并。相似观点参见 Rouhollah K. Ramazan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A developing Nation in World Affairs, 1500 - 1941*,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pp. 13 - 15; and Yahya Armajani, *Ira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1972, p. 91。

② 冀开运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2，第 494 页。

巴列维王朝(1925~1979)继续奉行“第三方外交”路线,但其目标在抗衡外来威胁的同时,更多地转向了实现伊朗国家和民族的复兴。鉴于美国仍未摆脱孤立主义传统的束缚,礼萨汗将“第三方外交”的重点转向了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礼萨汗的亲德外交成为苏英分区占领伊朗的直接原因,但这场战争也促使美国外交由孤立主义转向世界主义,充分认识到了伊朗对自己的重要性,从而成为伊朗“第三方外交”的可靠支柱。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巴列维国王(1941~1979)充当了美国控制和称霸中东的工具,使“第三方外交”沦为了一种对美依附外交。^①虽然巴列维王朝在维护安全和实现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与邻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总体上也比较融洽,但对美依附违反了伊朗外交第三环的核心原则,成为伊斯兰革命爆发和巴列维王朝垮台的重要原因。

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外交思想迅速成为伊朗外交的主导因素。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②并提出了“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和“七个反对”的思想。^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伊朗政府执行以反美为主的反西方外交、以反苏为主的反东方外交和输出革命的地区外交。四处出击导致伊朗在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四面树敌,在政治上成为美苏和伊斯兰世界遏制的对象,在经济上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在军事上打了8年的两伊战争,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到冷战结束之前,这条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而1989年霍梅尼去世为伊朗政府调整外交政策提供了可能。

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出任最高宗教领袖,拉夫桑贾尼(1989年6月~1997年6月)和哈塔米(1997年6月~2005年6月)先后当选为总统。拉夫桑贾尼是务实派,哈塔米是改革派,而哈梅内伊是能够包容务实派和改革派的保守派领袖。^④在此情况下,伊朗虽然没有明确放弃“输出革命”的思想,但对其激进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拉夫桑贾尼明确指出,伊朗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他国)领土完整以及其他国家人

① 刘中民 《当代伊朗外交的历史嬗变及其特征》,《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② 刘中民 《当代伊朗外交的历史嬗变及其特征》,《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③ 王新中、冀开运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第341页。

④ 冀开运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2,第34页。

民的社会和宗教价值”。^①在他的努力下，伊朗改善了与中东特别是海湾国家的关系，缓和了与除美国之外西方国家的关系。哈塔米担任总统后，对内推动经济和民主改革，对外倡导“文明对话”，进一步改善了与邻国、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全面缓和了与欧盟的关系，对美关系也出现了松动迹象。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伊朗与美国的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政府发动了针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驻军阿富汗并在中亚建立了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伊朗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布什总统还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三国合称为“邪恶轴心”。实现了阿富汗的政权更迭后，美国政府向海湾地区增派军队，紧锣密鼓地筹备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由于美国将战火烧到了伊朗家门口，并在伊朗东、西两面驻扎重兵，伊朗的国家安全形势严重恶化。加之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内政改革和外交调整引起了伊朗国内保守派的反弹，哈梅内伊为维护政局稳定也日趋保守，伊朗政府被迫进行反击。2003年2月9日，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前夕，伊朗总统哈塔米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伊朗已经在亚兹德地区发现铀矿并成功地提炼出了铀，伊朗将开采铀矿并建设铀转换和铀浓缩设施，以建立一个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系统。伊朗核危机由此爆发，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迅速升级，伊朗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紧张周期。

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为伊朗总统。内贾德作为伊朗保守派势力的代表人物，对外奉行一种“革命主义外交”路线，试图向伊斯兰世界推广伊朗的宗教民主制，从法理上冲破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②内贾德在2005年竞选时就表示，伊朗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就职后立即宣布重启铀浓缩活动，还撤换了核谈判小组成员。与此同时，内贾德屡屡发出惊天之语，宣称以色列应当被从地图上抹掉，伊斯兰革命的浪潮很快将席卷全世界。内贾德政府的强硬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2006年3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要求伊朗在30天内中止一切核

① 刘月琴 《冷战后海湾地区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06页。

② 田文林 《伊朗革命主义外交——理解第三世界政治的一种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1期。

活动。7 月 31 日, 安理会又通过了第 1696 号决议, 要求伊朗在 8 月 31 日之前暂停所有铀浓缩和后处理活动, 否则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7 章第 41 条采取适当措施。此后, 由于伊朗继续执行核强硬政策, 伊核问题六国磋商机制未能取得进展, 安理会从 2006 年 12 月到 2010 年 6 月对伊朗进行了四轮制裁, 加剧了伊朗的国内经济困难和外交孤立。在 2009 年的第 10 届总统选举中, 内贾德以有争议的得票率被宣布连任, 引起了被称作“绿色革命”^① 的严重骚乱。这表明保守派的民意支持严重下滑, 伊朗政府的内外政策面临着强大的调整压力。

2013 年 6 月 15 日, 在多数伊朗民众对极端外交政策的不满声中, 温和保守派人士哈桑·鲁哈尼以绝对优势当选为伊朗新一届总统。鲁哈尼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我从来不是极端主义者。我支持温和路线……这是智慧的胜利、温和路线的胜利和针对极端主义的胜利。”美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做出积极反应, 白宫在鲁哈尼当选的当天即发表声明, 表示“美国尊重伊朗人民在最近伊朗总统选举中的投票, 并对他们参与政治进程表示祝贺……为了给伊朗核问题找到外交解决方案, 美国依然愿意同伊朗政府进行直接接触”。鲁哈尼 8 月 4 日宣誓就职后, 提名温和派代表人物穆罕默德·扎里夫为外交部部长。扎里夫明确表示“新政府将执行温和的外交政策, 与世界进行建设性和有尊严的互动, 但绝不会在民族权利和国家利益上有任何让步。”

鲁哈尼上台前后的积极动向为伊朗调整对外政策提供了新的契机。上任一个月后, 鲁哈尼于 9 月 22 日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鲁哈尼 9 月 24 日在联大的发言与前总统内贾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保证“伊朗不是世界或中东地区的威胁”, 并声明伊朗已经准备好进行对话, 甚至承认大屠杀是“纳粹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巨大罪行”。11 月 24 日, 伊核问题六方会谈取得突破性进展, 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欧盟代表与伊朗代表达成历史性的《临时协议》, 伊朗同意在未来六个月冻结 5% 浓度以上的核浓缩活动, 停止高纯度浓缩铀工厂的建设, 同意联合国核查人员对伊核设施进行日常监督; 美国等国则代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承诺, 在协议期

^① 参见中国新闻网《媒体称穆萨维绿色革命失败伊朗改革希望幻灭》, 凤凰资讯,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yilangdaxuan/comments/200906/0615_6908_1202855.shtml。

限内不再增加新的制裁，同时协助安排进一步扩大人道主义援助，移除针对伊朗石油出口和国际金融的部分制裁措施。双方同意在六个月内就全面解决伊核问题进行细节谈判，从而达成最终解决伊核问题的“全面协议”。2014年1月15日，伊朗外交部证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签署《教法决议》，禁止伊朗开发核武器。伊朗外交部表示，哈梅内伊一直对研发核武器持否定态度。他曾于2012年表示，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他认为核武器是“罪恶的、无用的和危险的”。^①随后，各方开始向《全面协议》冲刺，在一年内密集地进行了多轮会谈。但由于在实质问题上难以弥合分歧，最后期限一再推迟，仍然未能达成《全面协议》。

作为上述演变历程的结果，当前的伊朗外交政策表现出三大趋势。

第一，从意识形态主导到国家利益为重。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一场“双重革命”，兼具超越领土的伊斯兰主义冲动和领土主权等民族主义关切。革命成功后，新政权一方面要实现国家的制度化，另一方面要在更大的范围内继续革命。^②然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具有实用主义的一面。“表面上的什叶派教义（dissimulation - induced Shiism）由实用主义的民族气质武装起来，对外允许‘好战的’意识形态与实际行动相脱节”。^③新政权虽然宣称要“在全球每一个角落支持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正义斗争”，但以“严格避免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为前提（伊朗宪法第154条）。霍梅尼去世后，伊朗政治领导层出现了“实用主义转向”的迹象，哈塔米的“文明对话”思想进一步缓和了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事实上，霍梅尼时期的革命外交是对巴列维时期依附外交的矫枉过正，终将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与生俱来的进行战术性妥协的调和能力”^④作用下，实现意识形态主导向国家利益为重的回归。不过，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和既得利益的束缚，意识形态在伊朗外交政策中的淡化是有限的、实验性的。

① 《伊朗称希望重启伊核会谈 就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1-16/4491271.shtml>。

② K. L. Afrasiabi, *After Khomeini: New Directions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 15.

③ K. L. Afrasiabi, *After Khomeini: New Directions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 11.

④ K. L. Afrasiabi, *After Khomeini: New Directions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 11.

冀开运教授指出,伊朗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时高度结合,有时互相支撑,有时互相依存,有时分离,甚至相互对立、矛盾。意识形态有时以国家利益表现出来,国家利益有时以意识形态表现出来。^①

第二,从四面出击到睦邻友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输出革命的激进外交导致伊朗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迅速恶化。从 19 世纪初开始,伊朗就面临着俄、英两个大国南北蚕食的局面。恺加王朝和巴列维王朝将“第三方外交”作为首要对外战略,就是要破解这种险恶安全环境。然而,新政权奉行“不要东方,也不是西方,只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路线,把伊朗置于东西两大阵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面,使伊朗再次陷入被两个大国敌视的险恶环境中。在与两个超级大国和两大阵营关系恶化的同时,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邻国的关系也频频告急,首当其冲的是伊朗与最重要邻国伊拉克的关系。两伊之间虽然积怨日久、矛盾复杂,但 1980 年 9 月两伊战争的爆发,主要是伊朗新政权的激进外交路线造成的。更加严重的是,两伊战争期间,美苏两个大国和阿拉伯世界几乎都站在伊拉克一边。严酷的现实使伊朗决策者痛定思痛,下决心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1988 年 11 月,伊朗国民议会议长拉夫桑贾尼明确表示,伊朗应当停止粗鲁外交以避免四面树敌。^② 两伊战争结束和霍梅尼去世后,在新任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任总统大幅调整了外交政策,使伊朗与周边国家、伊斯兰世界和除美国之外其他大国的关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第三,从依附大国到独立自主。如前所述,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通过“第三方外交”赢得了独立,并借助美国的支持崛起为中东的强国。然而,巴列维国王的亲美外交和西方化政策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那就是触动了精英阶层和伊朗民众时刻警惕外来控制的敏感神经。事实上,这是伊朗各阶层支持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原因。革命成功后,新政权不仅清除了美国势力,还与东西方大国同时拉开了距离。新的大国政策使伊朗实现了独立自主,但严重恶化了与各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招致了来自美国的一轮又一轮制裁。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36 年来,受敌对的伊美关系的制约,

① 冀开运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2,第 495、498 页。

② 冀开运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2,第 504 页。

伊朗与西方国家、伊斯兰世界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始终无法走上正常化轨道。由于经常面临着来自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压力，伊核危机爆发后还出现了遭受以色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不得不倚重俄罗斯的力量缓解安全环境。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伊朗政府始终奉行“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外交路线，俄罗斯多年来并未在伊朗国内培植起多少既得利益，一旦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爆发冲突，俄不大可能表现出叙利亚危机中的强硬。正因如此，伊朗外交由依附大国走向独立自主，实际上是走上了与大国斗法的道路。与以色列、朝鲜和冷战时的古巴相比，伊朗并没有哪个大国可作后盾，但却顽强地游走于挑战大国乃至国际体系的前线。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时不剑拔弩张，但始终没有像萨达姆和卡扎菲政权那样恶化到失控的地步，吸引着我们去深入挖掘伊朗“三环外交”的谋略和成败得失。

三 伊朗“三环外交”的成功与局限

自从公元前6世纪建立波斯帝国以来，伊朗历代国王和统治者对外交事务的指导原则持有大体一以贯之的看法。虽然时代和形势经常要求进行变通和修正，但取得外交成功的基本途径自阿契美尼德时期以来始终如一。由居鲁士确立的这些传统外交政策原则包括：第一，为了实现安全的最大化，必须尽可能地把伊朗的边界推向其“天然疆界（natural frontiers）”^①。第二，作为第一条原则的直接结果，要在边界沿线建立和支持一批缓冲国，作为伊朗的附庸以构筑一条外部防线。第三，保护穿越伊朗版图的商业线路上的终点站，这是保证伊朗的福利和繁荣的关键。第四，尊重和容忍伊朗境内的文化自治，这是波斯帝国因为涵盖印度、两河流域、叙利亚、埃及和希腊五大文明而延续下来的一贯传统。^②

上述四条原则与伊朗的“三环外交”战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伊朗横跨古代世界的三条东西交通干线，这一地缘位置对伊朗安全和福利的影响可谓喜忧参半：商业、财富和异域文化沿着东西方交通线滚滚而来，四面

① 伊朗的“天然疆界”指的是北到高加索，南到波斯湾和印度洋，东到中亚的河中地区。

② 参见 Hafez F. Farmayan,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A Historical Analysis 559 B. C. - A. D. 1971*, Middle East Center University of Utah, 1971, pp. 5-6.

八方的迁徙者和征服者也利用这些交通线进攻或者过境伊朗。^① 正因如此, 在历史上, 伊朗强盛时必然对外进行征服和扩张, 衰落时则遭到异族的入侵甚至长期统治。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和繁荣, 伊朗统治者必然要致力于控制周边邻国, 确立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 并以周边和伊斯兰世界为跳板, 通过与大国斗法获取和维护大国地位。在历史上和现实中, 伊朗的“三环外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也面临着一些不易破解的制约因素。

首先, 伊朗是一个具有大国志向的小国, 必然要纵横捭阖于“三环”之间。“第三方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小国外交, 表明恺加和巴列维两个王朝已经承认其大国地位成为历史, 只能以这种战略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为了在“三环”之间纵横捭阖, 作为小国的伊朗在实践中锻炼成了平衡外交的高手。一是在卷入伊朗事务的大国之间保持平衡, 不过分亲近任何一方, 以使它们相互制约。二是当两大国在伊竞争时奉行“第三方外交”, 以减少来自双方的压力。三是伺机开展“积极-消极外交”(positive-negative diplomacy), 以弥补本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不足。^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第三方外交”转向与大国对抗, 这是小国外交向传统的大国外交的回归, 也对伊朗政府的外交谋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 伊朗正因为是一个具有大国志向的小国, 经常追求超过自身能力所及的目标。^③ 伊朗人面对不尽人意的现实, 经常沉浸在辉煌的帝国历史中寻求安慰。这种怀旧情结表现在外交政策上, 铸就了伊朗决策者的大国情怀和收复失地冲动, 驱使政府经常追求一些无法实现的目标。恺加王朝的法塔赫·阿里国王时期, 伊朗与俄罗斯打了两场战争, 不仅未能收复失地, 反而丢掉了更多的领土和权益。立宪革命时期, 民族主义者致力于实

① 这些交通线分别: 北线是连接中国、中亚与小亚细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 经过伊朗境内的雷伊和大不里士; 中线经过雷伊和黎凡特; 南线经过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水路。参见 Yahya Armajani, *Ira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2, p. 5。

② “积极-消极外交”是针对大国的平衡外交的一部分。积极外交是周旋于大国之间, 积极主动地实现本国利益; 消极外交是向有关大国分别出让大体相当的权益, 以实现涉伊各大国的相互制衡。Hafez F. Farmayan,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A Historical Analysis 559 B. C. - A. D. 1971*, Middle East Center University of Utah, 1971, p. 16。

③ Rouhollah K. Ramazan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A Developing Nation in World Affairs 1500 - 1941*,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6, p. 32。

现“绝对独立”，招致了来自俄罗斯的干涉。伊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遭到俄、英的分区占领，都与伊朗政府的不现实外交政策目标有直接关系。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政策，使手段与目标之间的脱节达到了极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已经36年，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始终处于敌对状态，与欧美多数大国的关系也处于不正常状态。这种政策为伊朗招致了长期的制裁，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从长期看有悖于伊朗的国家利益。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经常使伊朗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这其中就包括伊朗与周边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第三，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是“具有特色的常态国际关系”^①。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始于伊朗的伊斯兰化，9世纪中期后开始了伊斯兰教伊朗化的过程。伊斯兰教伊朗化表明伊斯兰教完成了在伊朗的本土化和民族化，伊朗在伊斯兰世界中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进而推动了中亚和南亚的伊斯兰化，最终成为什叶派穆斯林的精神祖国。^②可以说，伊斯兰教的伊朗化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在伊朗的多种国家身份中，波斯民族和伊斯兰国家无疑是最重要的。霍梅尼虽然极力贬斥民族主义，声称“伊斯兰教中没有国籍……伊斯兰教的主体是人而非他们的民族，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但事实上，他一向把伊朗的民族独立置于第一位，而把伊斯兰教的团结放在第二位，宣布“捍卫伊斯兰共和国是一项神圣的职责，是凌驾于其他一切职责之上的”。^③所以，伊朗与伊斯兰世界既有共同的精神纽带，又有难以调和的教派分歧和冲突。伊朗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既有结盟型的（苏丹、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友好型的（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塞拜疆），也有敌对型的（沙特、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与非相邻的多数伊斯兰国家则是正常的国家关系。^④

以上是笔者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简要论及《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的主要贡献和精彩观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国家的

① 冀开运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2，第524页。

② 冀开运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2，第16、494页。

③ K. L. Afrasiabi, *After Khomeini: New Directions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p. 16-17.

④ 冀开运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2，第524页。

关系应当包括历史关系、宗教关系、文化教育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关系等。在经济领域不仅包括贸易关系、投资关系,还包括交通关系和能源关系。当然也包括双边与多边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多边关系非常值得研究。^①但是,书中论述的重点是政治、外交和安全关系,对其他关系多是一笔带过,对于多边关系则几乎没有涉及。从行文上看,文字的精练度有待提高,还有一些校对上的疏漏之处。此外,统观全书,感觉观点的理论性较低,但这似乎是史学著作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

综上所述,当今伊朗作为一个小国,原本应当立足周边,重点经营伊斯兰世界。但是,伊朗人心中装着无法忘却的辉煌历史,这种历史包袱驱使着他们再现以往波斯帝国辉煌。所以,伊朗政府经常追求超越自身实力的目标,在周边尚不能高枕无忧的情况下,越过伊斯兰世界与世界大国打交道,企图在与大国斗法中重温大国地位。这种不现实的做法经常使伊朗外交惊天动地,但并不符合伊朗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然而,伊朗在没有可靠后盾的情况下长期与大国抗争,时常剑拔弩张但始终没有让局势失控,表明伊朗政府确实深谙与大国斗法的谋略。这是其他小国、弱国可以汲取的经验,也是冀开运教授提示我们关注的问题。

^① 冀开运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2,第 16 页。

12. Iranian Tri-circles Diplomacy: A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Ji Kaiyun's Book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Islamic World

Zhao Guangcheng

Abstract: Iran is located in the heartland of the Middle East and surrounded by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Islamic world and the relevant major powers. As a small Islamic state with the ambition to become a major power, Iran has been pursuing continuously goals beyond her strength, thereby maneuvering among the above mentioned three circles. Though this Tri-circles Diplomacy has a grand tradition, it is beyond the reach of power and needs of interests to contemporary Iran, thus keeping the three circles in a state of crisis for Iran. However, in spite of the lack of reliable backing, Iran could always fight with major powers in crises with both open and secret means while not allowing the situations go wild; this in fact demonstrates the outstanding diplomatic strategy of Iran.

Keywords: Iranian Diplomacy; Islamic world; Tri-circles Diplomacy